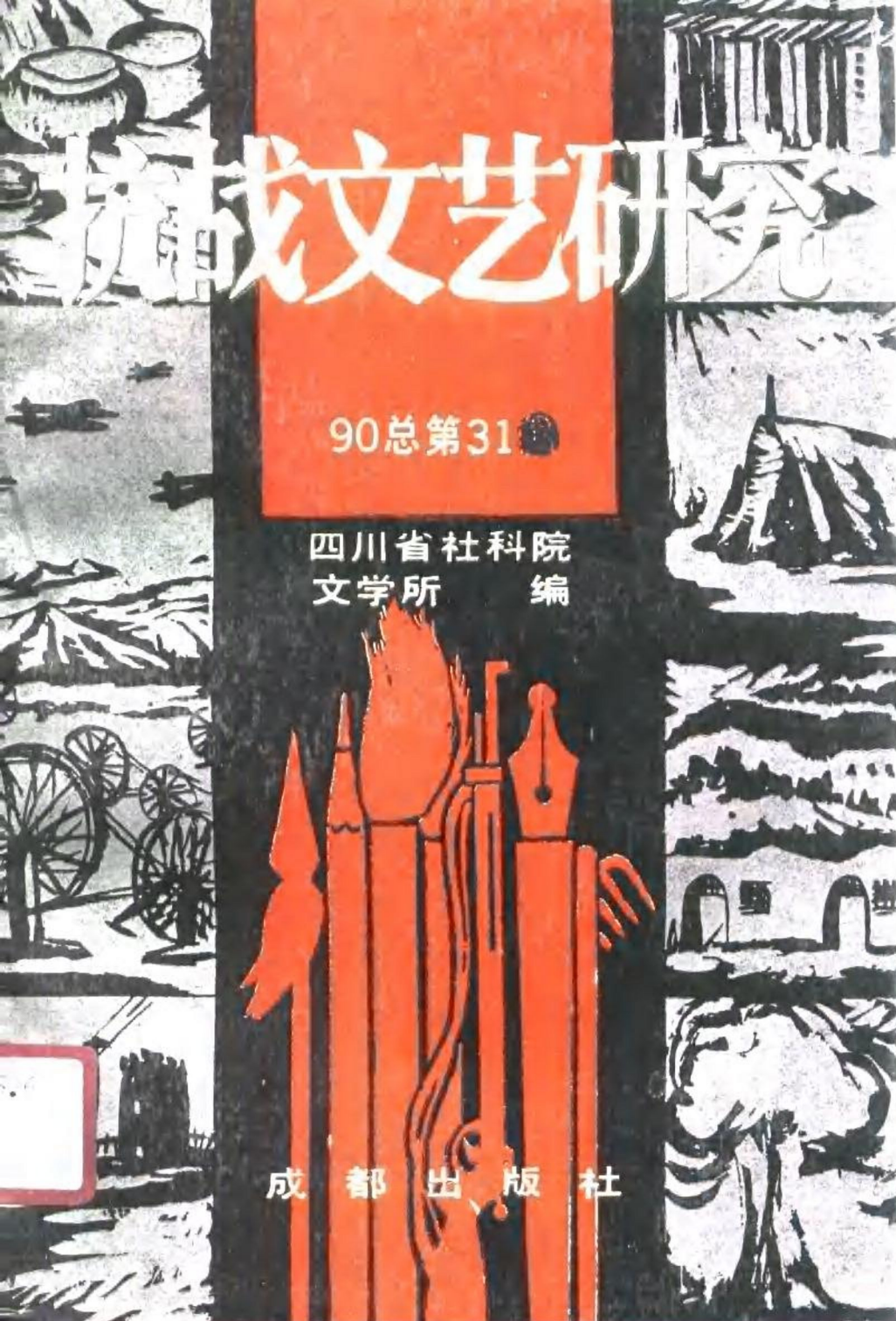




抗战文艺研究

90总第31

四川省社科院
文学所 编

成都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伯君

封面设计：黄 晔

版式设计：席维中

抗战文艺研究

90年总第31期

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编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街60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50千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575—114—5/I·9 定价：3.60元

目 录

《大后方散文论稿》序	方 敬(1)
到前线去, 发动政治攻势	
——漫话西战团在山西的活动	戈 焰(7)
延安行	吴福辉(13)
抗战时期林焕平的文学活动	李建平(30)
一部被遗忘了的杰作	
——长篇小说《故乡》辨析	吴 野(39)
国统区抗战时期的小说(1941—1945年)	文天行(56)
阶级抗争图 乡土风俗画	
——评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	王建中(75)
浓墨画人物 重笔写春秋	
——《天国春秋》漫评	张大明(89)
欧阳予倩抗战剧作述评	蔡定国(108)
国统区戏剧观众审美心理需要的特殊性	李 江(118)

胡风文艺思想理论及其与抗战文艺发展之关系·····杭 生(126)

巴人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王欣荣(148)

战斗的号角

——论街头诗运动及田间的街头诗·····王延晞(163)

抗日战争时期的绿原及其诗歌创作·····刘扬烈(174)

论大后方报告文学的时代精神·····鸿 飞(192)

抗日战争时期散文作家作品辑录·····赖富华(219)

大后方通俗文艺续谈·····杨 中(235)

《大后方散文论稿》序

□ 方 敬

《大后方散文论稿》所讲的不只是抗战文学中的散文，而且还有抗战文学中的杂文和报告文学。作者自己说他是从广义的散文来考虑而将三者放在一起的。这部稿就其组成来看是合三而一，而在论述上却又一分为三，从报告文学讲到杂文，再讲到散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八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丰富的抗战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三个方面的成就都是很可观的，很值得研究。经过研究，就大有可讲的，讲它的本质特征，时代精神，社会功能，艺术价值，以及在嬗变发展中的成就和影响，这也必然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现代散文，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洗礼，采用现代白话语言，借鉴外国散文，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出现于世。鲁迅先生早在1933年就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

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 (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从1917年至1937年的二十年间，现代散文已经发展起来，创出了自己的新品格和新特色。

抗日战争爆发了。文学英姿勃勃，奋起战斗。诗歌吹响了军号，插起了战鼓。戏剧，首先是街头剧、活报剧等，活跃在各处的街头和场地，鼓舞热情，激励斗志。报告文学，是“文学新闻”，迅敏地反映激动人心的抗日实景。散文象轻骑兵接踵驰去。小说也戎装上阵了。

散文，抒情叙事散文，沿着抗战总的指向，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作品源源不绝：歌颂热血的中华儿女的英雄爱国主义，浴血拼搏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和坚定信念；揭露和谴责日寇万恶的罪行，警惕和打击暗藏的汉奸败类的破坏捣乱，迸射出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愤怒；倾吐人民遭受的痛苦与不幸，逃难流离，饥饿死亡；大声急呼民主与进步，抨击政治上的黑暗和社会上的腐恶，颂扬群众艰苦卓绝的生活和斗争；眷念沦陷区破碎的家乡，失散的亲人和被践踏的河山，诉说离乡背井远走他方的苦难，以及打回老家去的渴望；向往北方抗日根据地，寄情于革命圣城延安，等等。总起来看，由许多不同的散文作家，老手和新秀，写出许多散文作品，胜于抗战以前。散文作家的生活天地扩大了，无论叙事或抒情，题材广，形式多，风格各异，多姿多采。为了争得民族的存在和解放，抗日救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艺术良心”或者“人的良知”的作家首先就要有爱国赤心，必具崇高的思想感情，以抗战为重，与抗战休戚相关，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写同抗战相关的题材，使文学为抗战到底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献出自己的力量。于是，散文小品就由抗战以前多写个人“身边琐事”进而到抗战时期多写“血雨腥风”，纵令是写“身边琐事”也得与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相谐。在这大时代中，心里负担着沉重的生，也负担着沉重的死，深深感到生者的伟大，死者的光荣。象雅舍的雅人的那种雅兴，超然于硝烟烽火之上，毕竟只不过是凤毛麟角，惟有自珍自赏，倒也是人间百相中似乎还少不得他那副雅相。

由于战时动乱，风云易变，不少作家劳忙奔波，赶写急就，于艺术创作力有未逮，相当一些作品难免不失之于空疏粗糙。但散文作品，由少而多，由粗而细，由浅而深，收获不少。我们应该重视那些出色的佳篇名作，它们感人肺腑，引人珍爱，于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仍不减色，相信以其不可磨灭的特有的光采传之久远。

杂文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新传统文体。“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咀脸毕露”。在旧时代的旧社会，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鲁迅先生，敌我界限判然，是非分明，爱憎强烈，他的杂文锋芒，所向披靡，胜利地战斗终生。被称为战斗武器、投枪和匕首的杂文凝聚着光辉的鲁迅精神。

抗战初期，关于抗战是否需要杂文的问题，曾有过争论。正确的论断：正是为了抗战和抗战的胜利，需要以杂文当刀枪打击敌人，作为明镜鉴照自己，鞭挞邪恶和弊端，充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作家们拿起杂文这一武器向凶恶的侵略者，向腐朽的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除了不少报刊登载杂文，还特为杂文开辟了阵地，出专门杂文刊物，出杂文丛书。

抗战时期杂文发展较快，1940年至1943年间，数量增大，质

量提高。适应抗战客观形势的要求，杂文最为敏感，笔锋的针对性和尖锐性突出，题材集中性较大，而又有广泛性，重点在抗战的大问题上，也涉及大后方社会各个方面，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则是中心主题。文章的品型、手法和风格呈现出多样性。

杂文的时间性强，有人说，事过境迁，明日黄花，既往的问题也就忘了。年长月久，那些事已成为历史，杂文不过是时文，不说朝生暮死，至少寿命不长。但是只要是好杂文，文思文笔双美，于今读来栩栩如生，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鲁迅先生的经典杂文和抗战时期杂文的精粹就是有力的证明。

报告文学，在世界诸文学门类中，是晚出的品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它发祥于欧洲，原来洋名叫 Reporage，舶来中国后译作报告文学。可以说，它是新闻和文学的有机化合为一，而不是二者机械相加或者简单混合。它有别于新闻报道、社会调查、访问记、通讯、速写、素描，等等，不要招兵买马，不要混为一谈。报告文学敏捷地反映当前真实的人和事，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现实性很强，报告文学与新闻各具有的优长于一炉的新文体一出现就博得读者的欢迎。

三十年代初，外国报告文学传到中国，先后介绍了名作捷克作家埃贡·埃耳文·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等，以及论著《基希及其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本质与发展》等。中国也开始注意结合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研究采用这种具有群众性战斗性的新文体，报告文学得以不断地成长，而且推出了一些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

芦沟桥的炮声一响，报告文学就应声奋起，以饱满的战斗激

情、昂扬的战斗意志、和充沛的战斗力量掀起创作热潮。“我们如果说中国新文学与中国的民众反帝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新文学中最新的部分）与中国民众抗日运动，可以说更有着不可分离的血肉的关系。”报告文学作家涌现，有专写的，也有兼写的，大家一齐动笔，满腔热血，满怀激情，满身热劲，成果累累。重庆出版社不久将出版的大型系列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报告文学就有三卷共一百五十万字之多。时间消逝了，而有生命力的上乘作品是不会消逝的。

抗日战争时期，还引进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和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时期的报告文学。许多苏联作家作了战地记者，各国进步作家组织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去支援反法西斯斗争，都以报告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有不少的优秀作品翻译了过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得以观摩、研讨，并受到启发，对中国报告文学当然也就是一种促进。

今天，中国历史已经推进新时期，四十多年后报告文学已有很大的发展而风靡文坛。回想过去，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抗战八年报告文学所走过的通到现在的那一程战斗的道路。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全民坚持抗战，维护团结，争取民主，要求进步，最后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必然是那一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在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中也都充分反映了出来。它们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时代使命，尽到了庄严的历史责任。这是后世应该自豪地记取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散文（这里包括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研

究至今还是一桩新的学术工作。尹鸿禄同志几年来热心致力于此，孜孜不倦，肯下工夫，搜集和积累大量资料，探讨不少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研究有所得，竟以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完成了《大后方散文论稿》。这一著作，在大后方散文研究方面，可以说带有新创精神。万事开头难，作者有攻克这个难关的勇气和毅力，真也难得。这种论述，尽管还免不了有什么不足，局限或者缺点，但对以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会有益处的。

1988年11月20日

到前线去，发动政治攻势

——漫话西战团在山西的活动

□ 戈 焰

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1937年8日建立于延安，1945年8月结束于延安。西战团的第一任团主任是名作家丁玲。以后七年时间，团主任是音乐家周巍峙。西战团在八年中，从延安奔赴山西前线南下到国统区——西安，后回到延安，又开往敌人后方——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后返回延安。它举起文艺大旗，开赴前线，深入日寇占领地区，行程数万里；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获得卓著成就。周恩来同志曾于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会上盛赞西战团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1983年元月29日，彭真同志在住北京西战团团员的集会上讲：见到了你们，想起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形。那时西战团是最穷的一个团，但都有很好的创作，很好的演出。你们在各方面，在晋察冀人民里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很困难，可是，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我只就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活动五年中到最艰苦的

山西边境发动政治攻势进行回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六届委员会。会议决定以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为党的路线，确定将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主要方面放在敌占区、敌人的后方。西战团立即响应号召，向党中央宣誓：“愿赴疆场宣传，战地服务”；又发出告同胞书：“同胞们，青年们，到前线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到前方。”党中央决定，丁玲等留中央党校学习，音乐家周巍峙为团副主任（1940年正式命为团长）率团立即出发，奔赴敌人后方——晋察冀边区。西战团沿途都保持了丁玲领导时期形成的革命文艺传统，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演出。当队伍来到陕北清涧县城时，突然遇到多才多艺的凌子风同志。凌子风抗战前就是个艺术家，他刚参加西战团，即为周巍峙所重用。党支委研究决定，任命凌子风为团编导委员会委员长。凌子风不光是导演，还能编、能演、能画，又是舞台装置家。他很快编出《人间地狱》和《侵略者的末日》等活报剧。正因为他是个有艺术实践经验的戏剧家，所以当西战团经过长途跋涉，通过层层封锁线到晋察冀后，他能根据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敌占区、游击区的特点，创造出一种“田庄剧”。这就是根据当地发生的事情，灵活多样地编出小型活报剧，或是把它编成独幕话剧，以天然的山地、平原、院落、房屋、田野作布景，演员还可以和群众混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街头剧的一种发展。

西战团到了晋察冀边区之后，当时受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领导，是边区以演出为主的专业艺术团体。同时它在音乐、美术、文学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对边区开展乡村歌咏运动和街头画、墙头画、宣传画都起了一定影响。特别是西战团以战地社名义，出刊《诗建设》、《歌创造》以及出版诗的专集（由田间、邵子南、曼

晴、方冰等诗人先后担任《诗建设》的主编，周巍峙、李劫夫、边军等先后担任《歌创造》的主编），与一军分区诗人钱丹辉组织的铁流社配合，对边区开展街头诗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些都是名诗人、名音乐家、名画家，但都得服从演出任务。晋察冀边区是以冀西阜平县为根据地，这块地方，山峦叠障，日寇每年都要集中十万兵力，进山里“扫荡”。1940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敌人又进山区“扫荡”，我们就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进行斗争。这时，周巍峙同志已被任命为团主任，他把我们全团分为若干小队，深入到游击区、敌占区，到敌人的碉堡、据点跟前，进行小型演出，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以配合部队发动政治攻势。在政治攻势中，我们每个小队，都根据凌子风创造的“田庄剧”的特点进行小型演出。就在这一年夏天，当我们完成了一、二、三、四军分区演出任务之后，就来到滹沱河沿岸游击区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加子弟兵。滹沱河沿岸土地肥沃，是晋察冀边区产粮区之一，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敌人进山里“扫荡”去了，我们在主力部队掩护下，到了游击区塘湖演出，选的是老舍先生编的京剧《忠烈图》中的一段，还有其他小节目，舞台设在一个大院里。我原本是团里音乐队的高音部演员，曾独唱过《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怨”，并在多幕话剧《模范国民》中演过乡姑，也参与跳抗日的集体舞，刚调文学队不久，与邵子南、曼晴、方冰、叶频等几个诗人一起，协助他们组织与编辑《诗建设》。恰在此时，我不知道邵子南等诗人到哪个队，去什么地方了，于是被编入凌子风导演的一支轻骑队，并当作一个“重要”人物来使用，担任提词，又要分管挂收幕布，还要演跑龙套的角色。在演戏的时候，我事先化好装，胳膊窝里夹了一根木制的标枪，手里拿着剧本，一忽儿到“舞台”的右边幕布后给唱戏人提词，一忽

儿又窜到“舞台”的左边幕布后给唱戏人提词，脑子里还要记住我这个角色该何时出场，怎样举标枪呐喊，眼睛还要时常瞅瞅导演的指挥，耳朵又要听着领队人的哨子声，辨别这哨子声是吹的紧急集合呢，还是戏演完顺利集合的声音……，把我忙得不亦乐乎。戏一演完，就留神散去的观众的表情，还和他们搭讪几句，不少都感动地对我说：

“你们戏演得太好了，希望今后再来！”

“你看，你们看”，群众指着约三里地的炮楼说：“那炮楼里的伪军，还站在炮楼口看你们演戏，还有的在擦眼泪哩！”

这时，我只是一个不到17岁的小姑娘，并不懂得什么艺术，听了群众的反映心里乐滋滋的，深为我这次参加政治攻势胜利完成任务而自豪。

1942年到1943年，是西战团参加发动政治攻势最频繁、最活跃的两年，而到的地方多为山西雁北地区的浑源、繁峙等游击区。由于晋察冀边区环境最艰苦、最残酷，敌人“扫荡”频繁，故而西战团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武装工作队，每个人都配备一点武器，时常一小队一小队地深入游击区、敌占区进行演出。演出前事先找好场地，舞台多设在院子的一方，观众和演员的界线是用棍子划一条线，不能挂幕布，利用自然场景，时常是利用房子、门板、墙头、窗子、梯子，甚至连群众的锅、碗、瓢、勺都用来做道具。为了使当地群众能接受、听得懂，台词都采用了当地的土话。在寒风凛凛的深夜，事先化好装，急行军赶到据点附近村庄去演出。如果发生了情况，不用几分钟，便迅速撤到山区驻地，

或是安全的地方。大家也不顾疲劳，修改剧本，烧水做饭，一切都由团员亲身去做，个个都具有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精神。繁峙在五台山的西北部，四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峦，山连山、川连川，山上都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山下全是敌人占领地区。敌人时常出来抢粮食，因而，粮食斗争便成了山下群众主要的问题。群众特别仇恨汉奸维持会的会长，当时，西战团采访到我军活捉了维持会会长王家祥，当即就编了《活捉王家祥》的剧本，用幕表戏（注：类似文明戏）进行演出，宣传了我军的胜利，激发了群众对汉奸的仇恨。戏一演完，群众掌声雷动，称赞这是个好戏，并提出一条意见，说把汉奸王家祥只交给人民政府惩处不解恨，应当改为人民政府当场枪毙，这才符合群众的意愿。《慰劳》是一个争取、瓦解伪军的剧本，演出这个戏，主要是为了争取、教育一个伪小队长。我们事先做了伪小队长家属的工作，由其家属把他叫回村子让他看戏。他看完之后直流眼泪，村里有人喊口号，他也跟着喊，感动得不想回去当伪军。西战团还在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协助下，演出了日本剧《我们的敌人是谁？》，使山下群众了解日本侵略军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中日人民大众应当携起手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团员胡斌是勇敢、纯真的姑娘，她因为胖，大伙叫她“小皮球”，又因为几次化险为夷安全归队，所以团员们又叫她“福星”。她是音乐队女高音部的演员。1942年的秋季政治攻势，她和宋骑、岳慎（女）还有刘沛等几个男同志到繁峙一带进行活动。他们事先化好装，到三十里以外山下一个炮楼底下的村子里去演出。村长是两面的，在敌人那一面，他被称为保长，而在我们这一面称为村长，暗地里组织群众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并时常把敌人的活动消息向我们报告。一次，据村长的报告，炮楼上的日军都

外出了，只剩下十几个伪军。他和伪军联系好，只留下一个伪军守炮楼，其他全部下炮楼来和群众一起观看西战团演出。为防日军突然回来，武工队架着两挺机枪对准炮楼。这次演的是《把眼光放远一点》，目的也是想通过演出，争取、教育、瓦解伪军。正在演出中，果然日军突然回来了，上炮楼一查，发现伪军都在村里观看演戏，但他们摸不准我们的底细，不放下炮楼，只好对着演戏大院打枪，我们武工队的机枪也冲着炮楼开火。全场观众立即轰散了，一个个躲回自己家里，一个人也未伤着。当时，胡斌和宋骑都是演的壮年妇女，根本来不及卸装，和其他男同志就迅速撤退，跑了三十多里，爬了个小山，气喘吁吁地回到宿营地。以后，听说那十几个来看戏的伪军，也不愿意回到炮楼，终于反戈一击，投降了我们的武装工作队。

西战团在发动政治攻势方面，特别是在1942年到1943年，在山西雁北、繁峙一带的活动，最为艰苦，最为活跃，演出的戏就达八、九个之多，大多是新编新演，也用了些旧节目，计有《活捉王家祥》、《哈那罗》、《慰劳》、《喜爱》、《把眼光放远一点》、《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在敌人不断“扫荡”、“蚕食”、“清剿”下，活动了五年，创作了话剧、歌剧、活报剧、街头剧和曲艺等大大小小近二百余个，《诗建设》出刊七十余期，还有《粮食》、《组织》等诗专集，《歌创造》三十余期……，创造了光辉的艺术战绩。这些战绩，充分说明文学艺术已成为人民的武器的重要部分。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文艺分会在西战团到晋察冀边区两年纪念上说：“因为它无论何时，总是以新民主主义的世界观把握着艺术和艺术运动，创造着艺术和艺术运动，它在晋察冀的艺术运动史上就留下一一种新的战斗的突出精神。对于这种精神，我们要宝贵它，提高它，普遍它……。”

延 安 行

□ 吴 福 辉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和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界。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背景是起伏的山地，白色的带有角檐的房子。沙汀夫人黄玉颀居中，身着短袖旗袍，短发，纤弱而白晰，颀颀地垂下双眼。她是那样的娇小。一侧是沙汀，显得清癯，穿白色的夏布长衫，头发习惯地从中间分开，有一绺总是不太服贴地扎撒着，神情严肃得过分。另一侧露出微微笑意的是诗人何其芳，黑黑胖胖的圆脸，架着眼镜，也穿夏布长衫，左袖捋起，手臂上潇洒地搭件衣服，象个大学生。这张照片是在川陕边境的宁羌（宁强）摄的，当时诗人卞之琳身边带着一只小照相机，他举手拍照的影子清晰地投在何其芳白色的身子上，奇妙地完成了一幅川陕道上的四人同行图。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劫后余灰，这张照片居然完好地保存在卞之琳的家中。

四人从成都出发北上的日子是1938年8月14日。已经是夏末初